

周恩來 最後600天

顧保孜·著 杜修賢·攝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周恩來在首都機場莊嚴告別賓客。



周恩來第三次訪問大寨。



周恩來在視察途中。



國慶招待會上，周恩來舉杯向大家敬酒。

目錄

第一章

禍起蕭牆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在例行檢查時發現尿中有4個紅血球，隨後被確診為膀胱癌。他不僅繼續擔負著繁重的工作，還承受著來自黨內外的巨大政治壓力。

淡然處之 / 27

抽薪止沸 / 38

復出之路 / 50

一衣帶水 / 57

南轅北轍 / 68

第二章

病魔纏身

周恩來的治療終於提到議事日程。然而，政壇暗流湧動，權力之爭加劇。

柳暗花明 / 99

求賢若渴 / 109

日理萬機 / 117

如願以償 / 122

再度受挫 / 131

忍辱負重 / 140

改弦更張 / 146

歲月留痕 / 157

風波再起 / 164

明火執仗 / 178

困頓病榻

1974年，周恩來的病情惡化，癌症轉移。他拖著重病之軀，千方百計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幹部。

- | | |
|------------|------------|
| 西風殘照 / 205 | 困頓病榻 / 219 |
| 掛肚牽心 / 228 | 垂暮之治 / 236 |
| 歡聚一堂 / 242 | 風生水起 / 250 |
| 生死一搏 / 259 | 情同手足 / 271 |
| 心願已了 / 276 | |

回天乏術

到1975年夏，周恩來體重僅剩61斤。他憑藉自己在黨內外的影響力，希望用生命的最後力量托舉鄧小平平穩接班。

- | | |
|------------|------------|
| 惺惺相惜 / 296 | 以忍為閹 / 302 |
| 暗流湧動 / 309 | 洞察秋毫 / 313 |
| 觸物生情 / 321 | 淚乾腸斷 / 332 |
| 直抒胸臆 / 342 | 因風吹火 / 350 |
| 逝者如斯 / 356 | 激濁揚清 / 363 |

彌留之際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來停止了呼吸。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完成了人生的最後謝幕。

- | | |
|------------|------------|
| 相濡以沫 / 379 | 臨深履薄 / 395 |
| 油乾燈盡 / 400 | 語重心沉 / 408 |
| 回光返照 / 414 | 難以回天 / 423 |

魂舞大地

“只見總理去，不見總理歸。”成千上萬的首都群眾佇立在長安街兩側，用淚水與懷念為周恩來總理送行。

剖肝泣血 / 449

力不從心 / 457

天怒人怨 / 461

眾怒難犯 / 467

風木含悲 / 473

最後使命 / 482

涓滴不遺 / 486

尾聲

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鄧穎超） / 495

後記 / 502

編後記 / 505

參考書目 / 508

採訪對象 / 508

患病歷程

1972

- 5月12日 尿中發現四個紅血球
- 5月15日 細胞病理學檢查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 5月18日 確診為膀胱癌

1972

1973

年度大事

1972

- 2月21日 尼克遜訪華
- 5月21日—6月23日 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開始糾“左”
- 7月2日—7月5日 陪同斯里蘭卡客人訪問大連、上海等地
- 8月15日 鄧小平解除“軟禁”
- 9月25日 田中角榮訪華
- 12月17日 毛澤東制止糾“左”

第一章

禍起蕭牆

1974

1975

1976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在例行檢查時發現尿中有4個紅血球，隨後被確診為膀胱癌。但他不僅繼續擔負著常人難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著來自黨內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批判極“左”思潮、“組閣”、“反對經驗主義”等重大問題上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逐步推舉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成為“總理”的接班人，為中國今後的前途和命運做出了關鍵的抉擇！



1972年2月21日，周恩來在北京機場迎接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



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接見首位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遜。



當尼克遜要和毛主席談共同關注的世界和兩國關係問題時，毛主席指著周總理說，這些問題我們不談，你和周總理談，我談哲學問題。



1972年2月26日上午，葉劍英、李先念、郭沫若、吳德等在首都機場送周恩來、尼克遜前往杭州、上海訪問。



1972年2月26日，周恩來陪同尼克遜在杭州西湖參觀。



1972年4月6日，周恩來陪同馬耳他代表團去南京訪問，疲憊不堪的他在孩子們中間都失去了笑容。



1972年6月28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書房與來訪的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談笑風生。



1972年9月25日，周恩來到北京機場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在書房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將《楚辭集注》送給田中角榮。



周恩來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談。



1972年9月29日，周恩來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簽署兩國建交協議。



周恩來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乾杯，兩人一飲而盡。



1972年9月，周恩來陪同田中角榮、大平正方在上海市郊馬橋人民公社棉田參觀。



周恩來在上海機場送別田中角榮。

淡然處之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在送走美國總統尼克遜後不久，一次例行常規檢查，尿檢中發現4個紅血球。從此，病魔如影，緊緊相隨。

1972年，中美關係進入一個令世界驚歎的新紀元。

尼克遜2月21日來到中國，成為第一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總統。他在中國訪問期間，都是由周恩來總理親自陪同，最後也是由周恩來親自陪同前往杭州、上海等地參觀。2月28日，周恩來在上海虹橋機場冒雨送別客人。尼克遜夫婦透過舷窗，看見周恩來站在濛濛細雨中，堅持不打雨傘向他們款款揮手……

就這樣，首位訪華的美國總統帶著不可磨滅的記憶，乘專機飛離中國。

尼克遜訪華的日程不過只有一週的時間，可這對周恩來來說，卻耗費了他好幾年的精力。正如一條完工的道路，通車只需要片刻的工夫，而築路工程卻是漫長而艱辛的。

周恩來為築成這條不尋常的路，凝聚了畢生的智慧，也耗費了生命的精髓。當一個個永恆的輝煌畫面不斷出現時，病魔的陰影也悄悄降臨！

尼克遜總統走後兩個多月的一天清晨，這天日曆上印著1972年5月12日。保健醫生張佐良從周恩來的衛生間取走了一個用肉眼看不出任何變化的尿檢小玻璃瓶。這是醫生按照慣例，一個星期要為總理作一次大小便檢查。

這一天，周恩來起床洗漱，簡單早餐後，照例來到他在西花廳後院的辦公室裡批閱頭一天沒有看完的文件。他在一堆文件裡看見一份中共浙江省委關於副省長馮白駒的病情報告，他心裡有些隱痛。這位被他譽為“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的老將軍在“文革”中捱整，身體與精神上受了很大折磨，現在又得了前列腺癌。“文革”以來，像馮白駒這樣捱整直到患上癌症的老幹部還有很多，但只要周恩來知道，他都會盡全力為其解脫政治審查的精神枷鎖，讓他們有一個較為寬鬆的治病環境。

周恩來心情沉重地在馮白駒治病的報告上批道：“馮白駒同志如患癌可進到北京日壇醫院來治，其夫人同來。”他寫完批示，心裡還有些不踏實，又拿起電話給中辦負責人，囑咐中辦將他的批示快一些轉告浙江省委，不要因為報告“例行公事”而耽誤了老將軍的治病。

周恩來
馮白駒
昨晤主席由我，譚
震林同志有一寸踏浪
（現在在廣東，有小河潭下
堂是林彪政字這所打
倒一批老同志的與醫所
做成的），但這是好同志，
應該讓他回來。
此等請診函，可否
由，他在桂林轉給了骨

此信西事，請向周副主席
三月廿八日

送曾冷幸明冷同志在
是幫他治好，王良恩就
了張文德話，可別地之
于寒林同志一取時近
情。
卸小平同志一取曾要
求做這工作，請政研
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
提過前次。周恩來
1972.12.18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手寫關於讓譚震林回來治病等問題的信。

就在周恩來盡力挽救別人生命之時，他自己的生命信息也傳遞出了令人不安的信號，命運之神向他亮起了紅燈。

第二天，周恩來的化驗結果送到了保健醫生手裡。張醫生一看化驗單，不由得心一沉——4 個紅血球！這就是說，顯微鏡下的每個高倍視野就有 4 個紅血球！

北京醫院是張醫生供職的單位，如果是平時，他在北京醫院門診坐診，這 4 個紅血球對診斷疾病是沒多大的臨床意義的。但現在不同，他手裡的尿檢報告是來自一國總理體內的信號。他不能僥倖，但也不能緊張，更不能馬上就聲張，以免造成大家的緊張情緒，干擾總理的工作。他連鄧穎超大姐也沒有告訴，而是悄悄給協和醫院泌尿專家、也是負責中南海領導人保健工作的主治醫生吳階平打了個電話，報告這一情況。

吳階平一聽，也覺得必須警惕。為慎重起見，他讓張醫生再多取幾次尿樣，以便進一步作病理化驗。

吳階平放下電話，他的心收緊了。周恩來總理是他最為熟悉也最為信服的人。從 50 年代起，他就和周恩來有過很多交往。周恩來十分賞識並信賴吳階平高超的醫療水平，曾多次派他主持完成國內外重大特殊的醫療保健任務。1962 年，周恩來得知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因腎結石導致左腎功能障礙，可能要進行切除手術。他對蘇加諾說，我們國內有很好的泌尿專家，我派他去給你看看，盡量不要手術切除。於是周恩來讓吳階平帶著中國醫療組去了印度尼西亞，經過 4 個月的努力，吳階平終於讓蘇加諾的左腎恢復了功能。為此，蘇加諾總統和夫人感激萬分，不僅設宴歡送中國專家，還給吳階平授予印尼國家二級勳章。從此，吳階平在蘇加諾眼睛裡，成了包治百病的全科專家，就連傷風感冒頭痛腦熱甚麼的，也要把吳階平從中國請去治療一番。吳階平後來又多次被周恩來派出國，為一些國家元首治癒了泌尿系統的頑症。吳階平這下名聲大震，真成了全

科專家的“國際保健醫生”。

此時吳階平多麼希望周恩來接下來的檢查，各項指標能和以前一樣，屬於正常範圍內，那4個紅血球只是一次意外的出現。

按照吳階平的要求，張佐良醫生還要再給周總理取尿樣。他面對常規檢查中最簡單的取尿樣，卻犯了難。

張佐良做周總理的保健醫生快十年了，十分了解周恩來的脾氣。總理每做一件事情都非常認真仔細，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如果剛作了常規檢查，又叫留樣化驗。周恩來一定會用疑惑的目光看著醫生，然後仔仔細細問個明白；要是醫生理由不充分，他會毫不猶豫加以拒絕的。他可不願意為沒有根據的懷疑麻煩醫生也麻煩自己，他的工作時間幾乎是以分秒為計算單位，哪能再添額外的項目呢！

為再次爭取總理的配合，保健醫生苦苦想了一天，為4個紅血球的出現想了5個理由來說服總理再作進一步檢查：第一可能是血管硬化，毛細血管滲血；第二是尿路結石，摩擦出血；第三是膀胱有炎症；第四是尿道血管畸形；第五是膀胱裡長良性瘤子。那麼第六……也是最後一個理由，他沒有說出來，因為這也是保健醫生最為擔心的——癌！

張醫生為完善這5個理由，又去找了鄧穎超大姐，聽取她的意見，以便說服總理的理理由再充分一些。被工作人員稱為鄧大姐的鄧穎超，在大家心目中，就是總理的第一道“安全檢查哨”，大事小事總是先和鄧大姐商量，取得一致意見後，大家再去執行實施，這樣不僅減少打擾總理的時分，也縮短總理了解與適應的過程。

畢竟鄧穎超的母親是一個中醫，鄧穎超從小就熟悉並諳熟中醫，以前她常請老中醫給周恩來看病開藥方，她本人也是常年吃中藥調養身體。當她知道周恩來尿檢發現4個紅血球，並不感到緊張，她覺得張醫生這5條理由有足夠的說服力，周恩來一定會配合的。她為張醫生能一次取樣成功，



鄧穎超和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西花廳合影。

還特地了解了這幾天總理的日程安排。

5月14日—18日，索馬里最高革命委員會主席西亞德率代表團來華進行國事訪問，周總理可能14日上午還在西花廳辦公，以後的幾天恐怕再難有時間聽醫生一條條地解釋取尿樣的理由了。

張醫生按照這個時間點，14日一早就在西花廳等候，果然周恩來在西花廳辦公室裡辦公已達十多個小時。張醫生趁給總理送藥的機會，勸總理休息一會兒。他知道總理心臟不好，這樣勞累是不行的，也藉此將需要再次進行尿檢的事情告訴總理。

周恩來看見張醫生進來送藥，只是機械性地抬起疲倦的臉龐，取下老花鏡，接過藥和水杯，一口把藥吞下，然後又把老花鏡戴上，繼續埋頭批閱文件，下午他就要去人民大會堂迎接外賓，可他的辦公桌上的文件仍然堆積如山。張醫生見狀，有些發毛，心臟不由得怦怦地跳：正在工作

的總理能有耐心聽完我的五條理由嗎？如果一口拒絕怎麼辦？

張醫生愣愣地站在原地，一時不知如何開口是好。

還是周恩來敏感，察覺張佐良神態有些異常，就抬頭問他還有甚麼事情？

“總理，是這樣的，前天檢查的小便，裡面有4個紅血球……”大夫清清喉嚨，盡量用平靜的語氣。

“這有甚麼大驚小怪！”周恩來懂一些衛生常識，小便中有微量紅血球屬於正常現象。

“總理，不是大驚小怪。發現紅血球，不管有病沒病，應該先搞清楚原因。”

“會是甚麼原因？”

果然不出所料，總理開始刨根問底了。

周恩來摘下老花鏡，身體後仰，靠在椅背上，那是準備好好聽聽他的保健醫生的分析是否有道理的姿勢。

醫生按照想好的五條理由，由輕說到重，一條一條擺給總理聽，才講了三條，總理打斷他的話頭：“別繞圈子了，是不是懷疑我長瘤了？你先別管我，先去治好康生的病。”

時任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得的是膀胱癌，開始也是發現尿中有紅血球，然後才檢查出癌細胞的。正是因為康生的病例，才使大家不敢放鬆警惕。張醫生聽見總理提到康生的病情，心情一下鬆了，說話也敢放開了，趁勢給總理做思想工作：“總理，在諸多的癌症中，膀胱癌是可以根治的，只要治療得早，預後是最好的一種。大量病例表明，能根治的病人佔三分之一，復發的病人佔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病人才……”

“死亡，對不對？”周恩來不等張醫生選擇合適的詞兒表達這個忌諱的字眼，就直截了當地說了出來。

和總理說話，最好直截了當，不要迴避：“對，死亡。”

“你說了這半天，究竟想要做甚麼？”周恩來目光認真。

“要小便，再作一次小便化驗。”

“就這個？”這個要求可能出乎周恩來意外，他“撲哧”笑出了聲，馬上爽快地答應了。“查吧，馬上？可以！”說罷，起身就去衛生間，張醫生趕緊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專門用來取尿樣的瓶子遞給總理。

張醫生拿到小便標本，隨即派人送往北京醫院病理科檢查。

第二天，周恩來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裡要舉行幾個外事活動。其中一項，是與第二次訪華的日本公明黨中央副委員長二宮文造就中日關係等問題進行長談，談話中周恩來得到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如果日本自民黨領袖田中角榮擔任首相，他就要到中國來談中日兩國關係問題”。這個信號令周恩來十分敏感，也十分振奮。他發出了爽朗的笑聲，用蘇北口音向日本客人發出了歡迎辭令：“有這樣勇氣的人來，我們怎麼能拒絕呢？不然就不公道了。”

而此時，西花廳與人民大會堂的熱烈氣氛正好相反，大家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嚴峻時刻。張醫生收到了北京醫院送來的尿樣化驗報告單與尿細胞病理學檢查報告單。尿樣化驗單上寫著“8個紅血球”，離上次尿常規檢查僅僅三天時間，紅血球數量竟增加了一倍。尿細胞病理學檢查報告單上赫然寫著——“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日夜揪心的“癌細胞”還是無情地出現了！

這9個觸目驚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廳值班室裡的空氣。大家一動不動地緊盯著這張化驗單，希望自己的眼睛看錯了這9個字。然而，這9個字寫在一國總理的檢查化驗單上，白紙黑字，誰也無法抹去。頓時，大家心裡像裝進一塊石頭，感到格外的沉重，幾個女工作人員忍不住哭出了聲，男工作人員只能跑到屋外，躲到沒人的地方吸煙、歎氣，來釋放

一下自己沉重的心情。其實，這種心情隨著“文革”開始，受總理苦悶、壓抑、憂慮情緒的影響，就在大家心裡埋下了。每次遇到總理遭遇命運不公，委曲求全時，大家苦悶的情緒就像漲潮的海水，一波一波地擊打在心岸上，久而久之，大家都有為總理鳴冤叫屈的感覺。苦悶中，張醫生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職責，現在必須爭分奪秒，與時間賽跑，盡快讓總理進入治療的“軌道”。

70年代還不像現在，人們對癌細胞的認識還不那樣一致和確定。一開始，北京的泌尿專家們認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會不會是尿中的變異細胞，因為尿液中的細胞往往是變化無常的。這些變異細胞不能直接診斷為癌症。

北京醫院病理科對此極為負責，他們又請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附屬腫瘤研究所的楊大望教授，協和醫院及解放軍301醫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來會診，仔細研究尿塗片染色細胞病理學檢查結果，最後大家一致認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的診斷可以確定。

周恩來真的得了膀胱癌？張佐良感到事關重大，立刻將病理學專家們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之結論，打電話通報了吳階平。

吳階平在電話裡許久沒有說話，他這幾天擔心的事情還是變為了現實。但是他還抱著最後一綫希望，讓張醫生再多請幾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他自己提出請友誼醫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與協和醫院泌尿外科吳德誠教授等人，一起集中到中南海進行會診。

儘管專家們在中南海會診也基本認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可以確診了，但吳階平慎之又慎，提出即刻派專家攜帶細胞病理學檢查的塗片標本等資料，趕赴天津、上海兩地，請那裡的專家在不知道病人姓名的情況下進行“背對背”會診。

5月18日，滬、津兩地泌尿外科臨床及病理學專家的意見和北京病

理學專家的結論沒有異議。這意味著 5 月 18 日這一天，周恩來被確診為膀胱癌！

周恩來不僅是一國總理，也是一個癌症病人的嚴酷現實，不容置疑地擺在了西花廳保健醫生的面前！

張佐良與吳階平等保健醫生一道，將此情況報告了上級領導，並請示下一步工作如何進行；同時，他們還建議應考慮向黨中央作書面及口頭彙報。

說來奇怪，自從第二次取了尿樣後，周恩來自己竟然像忘了這碼事一樣，也不問檢查的結果。怎麼一向注意細節的周恩來會表現出少有的疏忽呢？這很反常啊，可大家對總理的反常，也很糾結，既希望總理不要問結果，以免不會撒謊而洩漏了病情，但又希望總理能知道自己的病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啊！

醫生哪裡知道，周恩來此時心裡裝著一件重於生命的大事！

1972 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七個年頭。這七年，周恩來始終處於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和憂慮之中。此時周恩來身體所有的信號特別是不斷消瘦已經告訴他，此次診斷絕非一般小病。為了國家的未來與前途，他必須刻不容緩，抓住林彪叛國事件後出現的歷史轉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這面旗幟，在各個領域裡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惡果，盡可能多地解放中高級幹部，把黨和國家從危難和困境中擺脫出來。否則，他是無法安心躺在病床上治病的。

5 月 21 日，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 312 人雲集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這個會議從 5 月 21 日至 6 月 23 日開了一個月。

會議召開的當晚，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的意見，前往毛澤東處請示，可否將毛澤東在 1966 年 7 月 8 日寫給江青的信印發“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他作為較早就看見此信的人之一，覺得是時候發表了。

此時的毛澤東因為“林彪事件”，精神與身體都受到重大打擊，一直處於病魔纏身的狀態中。年初，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後不久，再次病倒，並且病情來勢兇猛。一次他突然休克倒地，經過醫務人員的全力搶救，才蘇醒過來。周恩來得知毛澤東病重的消息，坐車從他的住所西花廳趕到游泳池時，許久許久下不來車。下車後，他馬上指揮醫務人員：“你們要用全力搶救！”周恩來表情沉重，發自內心地說：“這個國家的擔子重，不能沒有毛主席！”

周恩來走近毛澤東床前，毛澤東的背後用被子和枕頭墊著，周恩來握住毛澤東的一隻大手，大聲喊著：“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來呀，主席，你聽見了嗎！”他的嗓音有點沙啞，而且有點發顫。

經過搶救，毛澤東醒過來了。周恩來很是感謝醫護人員和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事後，他還自己出錢請了兩桌飯犒勞所有醫護人員和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



1973年，周恩來看望病中的毛澤東，並且和汪東興及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合影。

大病後的毛澤東每天要吸氧，打針吃藥，不僅行走困難，連說話都氣喘吁吁，不要說出門參加中央會議了，就是在屋裡轉轉都很困難。但病中的毛澤東，他的大腦是清楚的，當周恩來提出公開他寫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時，他馬上表示同意，畢竟那封信裡他對林彪“藉助鍾馗打鬼”是早有認識的。信中有這麼一段話意味深長：

我的朋友的講話（朋友指林彪。講話，指林彪於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變”。—作者註），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有了毛澤東的點頭，這場“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成了一個大規模、高規格、長時間的會議，由此拉開了周恩來政治生涯中最後一場戰鬥的大幕——糾正“左傾”思潮，挽回“文革”損失！這成了相伴周恩來與病魔作鬥爭始終的政治使命。

這次會議上，大家第一次看見了毛澤東六年前寫給江青的信。毛澤東在信中表示對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關政變和個人崇拜講話的不滿和不安，為這次會議批判林彪集團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

毫無疑問，周恩來主持會議全過程，在他看來，“這一次是我們黨內第十次的路綫鬥爭，也是最尖銳、最嚴重、最複雜的一次階級鬥爭。”

抽薪止沸

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再次為自己的政治生命申辯。“伍豪啟事”如同一塊“重石”壓在他的心上，伴隨著腫瘤，不斷“蠶食”著他的神經與肉體。

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這一個月裡，西花廳裡的工作人員跟隨著周恩來腳步匆匆，早起晚睡，常常 24 小時連軸轉。別說總理是已經 70 多歲而且還身患重病的人，就是年輕人這樣不分晝夜也感到吃不消。不管大家多麼痛惜總理的身體，但沒有一點辦法讓總理停下匆忙的腳步，多休息一會兒。每一個工作人員只能恪盡職守，盡可能做好服務保障工作，為總理減輕一些工作壓力，多爭取一點休息的時間。在家值班的同志只要聽見鈴聲一響，就知道是總理招呼值班人員有事情，第一個反應就是跑出門，無論是到周恩來辦公室，還是去寢室或是餐廳，一路都是小跑。大家就一個心願，用自己的“快”為總理贏得一點時間，哪怕是一分鐘也好。久而久之，在西花廳這個大院裡，很難看見工作人員慢條斯理走路的身影。

工作人員一邊焦急等待醫療報告批覆下來，一邊盡心盡力照顧周恩來的飲食起居。但大家發現，周總理在會議期間情緒起伏很大：會議之初，他情緒高昂，中間則情緒低沉，會議接近尾聲，他更顯得心事重重。他不僅不問自己的病情，連吃中藥、多喝水一類的輔助治療都嫌麻煩，很不願意配合。

這是為甚麼呢？過了很長時間大家才知道，儘管會議只有一個月的時

間，但對於決心糾“左”的周恩來來說，卻是一個精神與身體倍受折磨的會議。

對於這場來勢兇猛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如同其他黨中央領導人一樣，思想上是缺乏充分準備的。1966年春夏之交，他正在風塵僕僕地忙於推動北方八省區抗旱和領導邢台抗震救災的緊張工作，就被捲入了這場政治風暴的中心。對於這種自上而下地鼓動、縱容群眾起來“造反”，有意造成“天下大亂”的作法，周恩來是很不理解的。他自己日後曾在不同場合不止一次講過：“連做夢也沒有想到。”

兩年之後，即1968年9月，他在接見首都工人、解放軍宣傳隊時還表示：“在同志們面前，應該說老實話，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很理解的，沒想到今天這樣的局面。”甚至在臨終前，素來不愛發火的周恩來躺在病榻上，還怒氣沖沖地提起“文化大革命”是“大熱天起雞皮疙瘩，真令人難以想像”。

當然，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認識，不能不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在“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過程的本質尚未充分暴露，並且被罩在神聖而虛幻的光環之下，周恩來和絕大多數人一樣，懷著真誠的願望，努力從好的方面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過它能夠真正克服和消除黨和國家肌體上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陰暗面，以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

但是，周恩來這一想法和毛澤東試圖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相差甚遠。這種思想與現實的尖銳衝突，使得周恩來陷入極大的困境之中。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以後舉行的一系列重大會議上，周恩來總是檢討自己的思想“跟不上”，“犯了錯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就檢查了自己總是“按照老的辦法，舊腦筋對待新革命、新運動”，並表示要以“一種熱情投身到戰鬥中去”。他在同年十月中央會議上發言說：“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努力緊跟毛主席，但‘有時仍有掉隊

之虞’，但我有一個信心和認識，知過必改，努力趕上。”這些都生動地反映了周恩來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努力想加以理解，而又感到無法理解的矛盾心情。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越來越清楚



1970年，“文革”色彩很濃，周恩來和大家一樣，會議前後總要舉起“紅寶書”。



在“文革”中忍辱負重的周恩來

地顯現出來，周恩來也更加感到困惑與為難。周恩來的為人性格，正如中外人士所評論的那樣：他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他不爭權奪利，他從不向至高無上的地位發起挑戰。有一天動亂結束，如果他依然在位，那麼一切在他手上都會好起來的。

所以，在歷史的悲劇面前，周恩來的性格與品行決定了他只能忍辱負重，苦撐危局。

1966年12月，他在與並肩戰鬥了幾十年的老戰友李富春的一次交談中，傾吐了內心深處的這一信念：“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文革’中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八個字最能表達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內心活動與動力。

林彪叛逃事件，給了周恩來阻止“文化大革命”狂亂腳步的機會。他希望通過批林整風達到徹底批判極“左”思潮，以挽回“文革”造成的不利影響。在可能的情況下，一步步地把被打倒的老幹部扶起來，把五年計劃重新制定起來，把規章制度恢復起來，到最後重新再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周恩來高舉反“左”大旗，開始抽薪止沸，糾正“左傾”錯誤路線。然而他糾“左”能夠如願嗎？他的使命能夠實現嗎？

以後的事實告訴人們，這是一次不容易到達目的地的政治苦旅。

因為林彪集團已導致全國各行各業“左”傾氾濫成災，長期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的人們，他們的生活軌跡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左”傾色彩。寧“左”毋右，是大家求平安的普遍心理狀態。

周恩來作為這次關乎他糾“左”成敗的會議主持人，不僅需要政治勇氣，也需要藝術方法，更需要智慧謀略。他清楚地認識到，糾“左”，必須得到毛澤東的認可與支持。於是他提出了將毛澤東六年前寫給江青的

信件作為這次會議的重要文件下發。

此信既能表明毛澤東“文革”初期對林彪是有戒備的，甚至是懷疑的，同時也是對江青等人不能再繼續走“左”傾道路的一種阻止與暗示。

歷史往往是一面鏡子，可以照見現實。為了讓“左”傾思潮得到更扎實更有力的批判，周恩來用了三個晚上的時間，即1972年6月10日至12日，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作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綫鬥爭的個人認識》的報告。

報告依次就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瞿秋白盲動主義、李立三冒險主義、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以及抗日戰爭時期的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歷史過程、錯誤危害等，詳加論述和說明。在談到王明“左”、右傾錯誤的問題時，他結合個人親身經歷，對自己作了嚴厲的剖析乃至過分的檢討。

為準備這三天晚上的發言，周恩來用了一個多星期時間。

周恩來在追溯黨的歷史與自己走過來的足跡時，心情是沉重的。他難忘腥風血雨、艱難困苦的征戰歲月，更難忘失去鮮活生命的戰友們。他對與會各級高層領導們說：“我入黨五十年，沒有離開黨的隊伍。經過長期的複雜而又激烈的黨內外、國內外的階級鬥爭和革命戰爭的考驗，我還在為黨工作，繼續堅持對敵鬥爭；年老了，也還有些革命朝氣。”他希望現在凡是在林彪反黨集團的陰謀活動中沾了邊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應該得到啟發，不應該有任何顧慮。要徹底交代，認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批“左”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收到很好的效果。

這段時間，周恩來似乎忘記了醫生們在他體內密集取“血、便、尿”標本送往醫院檢查的事情。他甚至連多問一句檢查結果的想法都沒有。他